



華裔政商





李崇維先生

市議員/非洲台灣商總會副會長

由於父親來南非探訪親戚，愛上了南非的美麗，因此舉家搬來南非布魯方丹。當時1990年，種族隔離的時代末期，李崇維是全校第一個華人學生。

李崇維的本業是工程師，也擁有許多跨領域的事業。當初會從政也是個意外，由於首都Pretoria從來沒有華人議員，所以僑界的前輩推他出去了解狀況，一路誤打誤撞居然選上了市議員。身為最大反對黨Democratic Alliance, DA 的市議員，李崇維坦言南非政治這條路很難走，ANC一黨獨大，完全不會理會反對黨的意見，但因為ANC執政的狀況並不好，所以DA有成長的趨勢。南非最嚴重的問題莫過於貪污，舉Pretoria為例：市議會的年收入是200億南非幣，但目前居然是近乎破產的狀態。

關於南非幣持續貶值，李崇維分析是因為電力的問題，因為當時發電廠的規劃規格錯誤，導致電力不足，必須輪流限電，就算公司有自備發電機，但電力成本是二十倍，企業無法正常運作，南非幣自然大幅貶值。

BEE最主要是要幫助黑人創業，同樣是黑人和白人的企業，黑人企業的BEE點數比較高，那就拿到政府的生意。李崇維指出，BEE的法案第一波不是很成功，是因為白人企業拿黑人當人頭，就能夠拿到政府標案、單子，當時的黑人在股票市場的持股只有7%；改革後，黑人必須實際在公司中控制權，但在麼多年努力後，目前的持股也只有9%。更甚者，BEE法案也只優惠到少部分黑人菁英，目前政府先把菁英拉上去金字塔頂端，但是底層完全起不來，出現了800萬納稅人養5000萬赤貧人口的窘境。李崇維認為種族隔離結束至今已逾20年，他認為BEE也是變相的歧視，雖然立意良善要對於過去作出補償，然而應該要有落日條款，目前也差不多要結束了。要真的能徹底改變黑人的生活，只能靠教育還有培養上進心。

另外，李崇維認為目前南非失業率很高，政府也很棘手，然而很可惜政府的觀念不對，以為增加就業機會就是多開幾個政府工作名額讓親朋好友工作。

不過，身為市議員李崇維還保有最初的熱忱。面對政府不合理的作為，他總是第一個帶頭跳出來，抗議政府高官為親友安插酬庸性質工作、抗議亟不合理嚴格的簽證核發方式，甚至不惜犧牲色相，穿裙子到市議會抗議忽視女權與兒童權利。李崇維以自己的方式推動南非社會前進。





前南非國會議員

王翊儒先生

兒時旅居美國，14歲移民南非。早年因為經商的母親英文較差，王翊儒從小幫母親做翻譯，很早就接觸商場，也因此比同齡的人早熟。爾後，母親投入慈善事業，創立開普敦慈濟基金會，王翊儒仍繼續擔任母親的英文幫手，也因此與政商界較多往來。王翊儒大學就讀開普敦大學資訊企管，也曾經投入學生運動。大學畢業後，和朋友組公司並因為IT的專長受Independent Democrat (ID)青睞，延攬參政。王翊儒26歲代表Independent Democrat (ID)參選國會議員，一舉進入國會（National Assembly）殿堂，成為南非史上最年輕的國會議員。之後被南非執政黨ANC透過Floor Crossing制度挖角，成為ANC籍的國會議員。

關於BEE法案，他曾是參與修法的人之一。因此，與我們分享了許多經驗和心得。起初，BEE由白人制定，25%黑人持股是基本門檻，比例越高，BEE點數越高；BEE點數越高，越能承接政府採購案。藉此，白人企業，透過承包的方式，轉移利潤給母公司，造就少數億萬富翁。此舉受到嚴厲批評，隨後便將BEE法案修正為BBBEE。BBBEE將黑人雇用比例、公司給予的職業訓練、社會責任加入點數計算中，期望對協助黑人就業有更實質幫助。然而，任何政策都不免存有瑕疵，例如許多企業會抱怨黑人員工素質不符合要求，若依規定是一大負擔。王翊儒則認為沒有競爭力的企業看到的是阻撓、有競爭力的企業看到的是機會。

談及為什麼南非的華人普遍有多重身分，王翊儒認為現在這個社會沒有所為的「鐵飯碗」，在這個多變的時代唯一不變的就是「改變」，所以唯一的生存之道是擁有「很多個飯碗」，其中一個破了，還有其他的，假若真的不幸通通都破了，如果有能力建立起這麼多個飯碗，那就有能力再重拾飯碗。他認為最可怕的是「只有一個飯碗，然後誤以為那是鐵飯碗。」此外，他也和我們分享南非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。一個成年人不工作每個月也能領到1500-2000南非幣的社會補助、50度的電以及乾淨的水等。這不只降低南非人工作意願，更是財政的一大負擔。至於當我們問到為何白人會認為現在的南非社會不公平，他的解讀則是：因為過去20%的人使用的80%的資源，所以一旦社會重新分配必然感受落差。

最後，王翊儒鼓勵我們無論時代如何變動、政策如何調整，培養自己多元能力才是因應萬變的最佳方式。

